

继《一个人的战争》之后又一长篇力作

纸感地带
ZhiganDida
001

妇女闲聊录

FUNUXIANLIAOLU

林白/著



著名女作家林白突破之作，
被众多评论家称为“最胆大包天的尝试。”
口述实录式的中国农村女性生活调查，
个案追踪式的农村社会关系解析。
迷离隐秘的私生活，
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
快乐哀伤的平凡生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林白/著

张润世/绘图

妇女闲聊录

Funü Xianliaol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妇女闲聊录 / 林白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2

ISBN 7-80148-721-4

I. 妇… II. 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J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774 号

新星出版社发行

地址: 北京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 邮政编码: 100007

联系电话: 010-84094409

传真: 010-8409478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Email: newstar_publishers@163.com

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25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白沙

作者: 林白

装帧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

插图: 张润世

定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著名女作家林白突破之作，
被众多评论家称为“最胆大包天的尝试。”
口述实录式的中国农村女性生活调查，
个案追踪式的农村社会关系解析。
迷离隐秘的私生活，
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
快乐哀伤的平凡生活……



林白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

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19岁开始写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等多部，有《林白文集》四卷，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居北京、武汉两地。

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被列入200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入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3年中国书情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中华读书报》推荐2003年值得阅读的纯文学作品。

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

——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

贺绍俊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由 200 多个片断组成的,它暗寓着世界的整体性已经被彻底粉碎。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里,世界只不过是无数碎片拼凑成的。这也就是后现代派为什么热衷于碎片处理的原因。施奇克说:“我们在片断中感知,在片断中生存,也必然在片断中死去。”林白对于后现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所以我对她完全采用片断的方式来结构长篇小说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

说句玩笑话,“女大十八变”真可以用来形容现在的林白,不是说她的容貌变得快,而是说她的写作变得快,变得简直让你眼花缭乱,惊诧不已。林白曾经被公认为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她定格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位沉迷于自恋中的坦荡女性,她呵护自我的情感世界和自我的女性躯体;情感和性,构成了她的小说世界的基本元素,她把情感和性情心扎成唯美的花朵,这种花朵封闭在她的自恋的精神堡垒里,也许过于脆弱,外面世界的风会把它吹得零乱不堪。因此这就导致了林白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承受各种指责和打击。她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指责和打击,并且更加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是她能够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惟一方式。

然而自恋中的林白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玻璃虫》中有所透露,她像一只柔软的虫子朝着外面蠕动,不过那个封闭在自恋精神堡垒中的林白在读者的印象中太强大了,因此《玻璃虫》中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到了去年的《万物花开》,林白就像是破茧而出,化

蛹为蝶，她彻底从自恋的精神堡垒中走出来，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姿态。虽然她一再对社会有着小心的提防，但一旦她勇敢地走入社会，她就什么也不怕，任着自己的想象在大千世界里驰骋，这种开放式的驰骋与她封闭式的自恋并不相矛盾，她的自恋说到底仍是一种对抗的方式，是一种逃逸中心的自我保护法，而她通过一位乡村孩子，发现了一个与中心相异的万物世界，她自然会放松戒备之心，因此《万物花开》仍是林白的风格。我以为林白会沿着《万物花开》的路子还要走一段，起码也应该将这条路走得更平坦一些吧。然而没想到一年之后，她拿出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路子。她在这部小说中显示的姿态是，她面对大千世界不仅要放任想象，而且要放任言说，她通过一位乡村妇女的嘴发起了一次叙述的革命。

二

这是一部充满后现代精神的小说。它用一种新的叙述颠覆着许多习惯性的东西。如果说，在《万物花开》中，林白是把自己头脑中的后现代瘤子移植到一个乡村孩子的头上，通过这个孩子去看社会；那么，到了《妇女闲聊录》，她干脆让乡村的一位女子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她拱手让出作为作家的话语权，于是一场语言的暴力发生了：来自乡村的声音打乱了文学讲坛的井然有序，这多少有些像 80 多年前被毛泽东称赞过的农民运动，这种未经训练的、粗鄙的乡野之音居然放肆地跑到地主小姐的绣花牙床上翻滚。

林白在这部小说中采取的方式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她选定了一位乡村女子，显然这是一位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女子，让这位女子在无所约束的状态下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种方式说起来也不新鲜，曾有一些作家做过类似的口述实录体的实验。而且文学中的口述体恐怕还来自于历史学界。口述历史被作为挑战传统历史观的重要方式，就在于倡导口述历史的学者们意在通过口述历史来达到重新阐释被阶级、种族矛盾冲突所强制的历史，因此口述历史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游离于权力中心

之外的民间。但在口述历史中,叙述者始终是被动者,口述历史最终必须通过组织者的理论之网的筛选,而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看上去处在被动的位置,她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的环境,使得那位叫木珍的女子在释放了一切精神压力的状态下自由地宣泄,从而达到了巴赫金所说的民间语言的狂欢。林白逃逸中心的企图最需要这种狂欢精神的鼓励,因此她会沉浸在木珍的宣泄里,她所感应到的也是宣泄中的狂欢。她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林白以自己的方式复制了木珍叙述中的狂欢精神。

在这种复制中,林白充分展示了民间叙述的力量。也许我们会发现,所有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学叙述,其最初的原始形态就存在于民间叙述之中。比如第一百四十几段中的“她让疤子别打牌,他发誓不打,拿起一把菜刀,把小指头砍了,伤还没好,又打。”这简直就是一篇由文人撰写的笔记小说,精练,传神,蕴含丰富。但这种精练和传神显然又不同于笔记小说的文人风格,它不在于遣词造句的讲究,所以它的精练不是对文字的浓缩化和典雅化,而是通过对事理的淘洗所获取的一种生活结晶体,这种结晶体使因果关系高度抽象化,让人有一种直逼生活本质的感觉,我以为这正是一种民间风格的精练。而从文学演进的过程来看,应该是先有这种质朴的民间风格的精练,然后才有文人风格的精练。

三

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作家们普遍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他们亲身体会到伴随着社会秩序瓦解而带来的文学话语大厦濒临倒塌的危机,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到阐释世界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做得比较彻底也比较成功的,应该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至今我们对于《马桥词典》的革命意义认识得还不是很充分。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很高兴地读到了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从阐释世界的角度说,《妇女闲聊录》具有与《马桥词典》相类似

的意义，它们的意义都在于从话语系统的角度对民间社会重新进行阐释，从而展示出现实世界中被既定的权威话语所遮蔽的一面。

这两部小说都是拆解了现成世界的整体性，然后用另外的话语系统将拆解后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当然，韩少功与林白是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作家，他们所选取的角度也迥然两样。韩少功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从语言入手，将马桥世界拆解为一个个零散的字词，这些字词既是马桥人的符号，也是马桥人的历史和文化，而韩少功通过语词还原了马桥人的历史和文化本相，在这种还原中体现出韩少功的理性和思辨性。而林白是一位意象型作家，她把王榨村的生活拆解为一位叙述者头脑中的一段段的记忆碎片，在形而下的层面还原了生活的本相，这种还原完全是感性的和情绪化的。

木珍的叙述完全表达了民间的立场，这种叙述所构造起来的世界显然不同于既定文学叙述中的世界。既定文学叙述中的世界服从于公理和逻辑，而公理和逻辑代表着社会的权威。但在木珍的叙述中，公理和逻辑遭到了蔑视，王榨村的人以自己的世界观处理日常生活。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潜在的民间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左右着王榨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说的叙述中多次涉及到王榨村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如木匠从海南带妓女回家，“木匠的妈妈心疼钱，当着大儿子、二儿子媳妇的面跟三儿子媳妇喜儿说，你大哥跟别人好还要花钱，不如跟你好算了，你闲着也是闲着，他大哥也不用给别人钱。”又如叫和尚的女人在家偷情，她的公公来干涉，她就骂公公是老畜生，她生的儿子一个像四伢，一个像三类苗的哥，她的丈夫仍很乐观，就说他没儿子，只有女儿。又如“木菊跟她大姐看上同一个男的，趁她姐夫不在家，这两姐妹就跟这个男的睡，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这些性事在一般的文学叙述中无疑会成为引发思想和情感激烈冲突的重要情节，像是具有巨大能量的炸弹，一旦爆炸就会血肉横飞。但在木珍的叙述中，这些看似惊天动地的性事完全被日常生活化了，这种日常生活化显然表达了一种民间的世界观。一方面，人们并不认同这类性事对于伦

理道德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既然这类性事发生了,也就被生活接纳了下来。伦理道德秩序就是一种公理和逻辑,它构成了炸弹的能量,所以木珍的叙述就像是做了一件摘除“引线”的工作,这些炸弹的能量虽然并没有消失,却不再具有杀伤力。木珍的叙述就在不断地做这种摘除引线的工作,这正是潜在的民间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种极强大的协调和吞并的功能,它并不抵制公理和逻辑,而是包容下公理和逻辑,化解了公理和逻辑所带来的紧张矛盾冲突,使民间的生活充满源源不断的生机。如在这段叙述里:“有个女的嫁到我们村,她要跑,也不用离婚,就从男家跑到另一个男的家住下来,这个男的怕她再跑,赶紧去领结婚证,结果还是跑掉了。”我们就发现,法律在王榨既存在着,又被悬置着。如在民兵训练的一段叙述里:“这个区集训的只有三个女孩,三个女孩都有点胖,睡在一个床上,笑呢,说我们三人可别把那垫床的砖给压断。”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性事件就这样被置换成戏谑,但又无伤大雅,不损耗民兵训练中所包含的政治权威性。从一个乡村妇女的闲聊中传达出这么多我们在正式谈话中所感受不到的内容,这恰是由于她的闲聊中包含着另外一种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构成了民间的世界观,我们通过民间的世界观,看到了社会日常生活顽强持久而又充满活力的一面。

乡村妇女传达出的民间世界观造就了林白在叙述上的革命,而且林白丰富的感性知觉使她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充分保留了口述实录过程中的汁液,这无疑让读者能品咂到更丰富的滋味。但沉迷于感性知觉也使得本来可以更明晰的意义变得含混不清。这大概是我对这部小说有所不满意的地方。

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

——《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

施战军

在这近十余年里，中国文学长大成人的影像相当清晰。遥想那个叛逆的“个人化”时期，那些标志性作家就像撒娇任性的青少年一样，惟我独尊又牢骚满腹，姿态、语式和装扮都在一个自以为本真的狭隘世界中奔闯招摇，但是在集体代言叙事仍旧强大的语境下，他们以个性表达逆反的热诚和创造的渴望，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到钦敬。在不断的摸索和调整中，写作的成长经验和转换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它必将带来对自我的文学命义的质疑和蜕变。除此，对世界经典文学资源——尤其是作家情怀与作品品质的关系——的领悟，让我们看到这几年在充分“个我”之后，“他者”已经成为中国作家中的优异者所倾心关注的对象，经由阅历的成熟，他们意欲直面“我们”的人性生存状况，以呈现的方式给庞杂繁复的日常生活理出某种头绪，进而看清自身所处的时代裂变的真切性。于是，“一个人”和“他们”达成对话的心心交流的文学时代正在开启，一个有所承担、在充分包容中尊重、体恤甚至化入“他者”的文学路向即将豁然开朗。

在这种路向由影影绰绰至初现端倪再到拓宽延伸的过程中，可能再也找不出比林白更具代表性的作家了。1990年代初、中期，她的《一个人的战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和“个人化写作”的范例被强调到了几近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如今我们重读作品，却发现它的视阈远不像当时危言耸听的评论尤其是一些“女性文学”专家所讲的那样自闭，在今天，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对自闭的小世界的发难；上个世纪末，《玻璃虫》的问世，林白对“成长”的经验性想象达到了她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那是一种类似“成人仪

式”般的纪念品,但“自我中心”“个性至上”的倾向依然强悍,作家主体始终鲜明在场,必然会使作品成为“观念”或者“姿态”抑或“立场”的演绎和注解。这一两年,“它者”取向即将成为一种通识的时候,林白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万物花开》,在我看来,一方面这部作品的涉性成分过多,在一定程度上乡野的景观被缩略了,写作的惯性和超越性大概是平分秋色的;另一方面可以见到林白对庞杂繁茂的现实进行把握的巨大可能性,情怀已经打开,叙事世界大开大阖,过去那种表现主义气质的现代女性叙事的痕迹,随着情怀的廓大,已经被关注和写照“他者”的激情所覆盖。而且,《万物花开》的地面上,作家根本不可能恢复别人曾取巧获得的代言人角色,而一定是选择做一名呈现者,在这本书的后面附录部分,她似乎在告诉我们:呈现的极致就是实录。

——就这样,在一种路向刚刚从这一端显露了方位的时候,林白已经走到了那一端。中间的虚线和实线也许她接下来会完成,但是更大的可能是由别人填满脚印。《妇女闲聊录》因为特别的文体和语体,它将是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又因为它极大的人生容量和极浓的乡俗文化气息以及时代变迁标本价值,更因为潜隐在“他者”对面的主体的不露声色,我也敢注定它会留在未来的文学史书页间。

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完全的他者”。作家没有一句插话,她只是一位倾听和记录者,而且几乎是照录,讲述的原始模样得到了完整的留存,不照顾词汇、语法、修辞以及逻辑的通用性。读来看似粗糙,实则用意精深。一个进城打工的女人两个年份的滔滔不绝直至构成一部长篇,远比《说吧,房间》时代的个性述说更有难度。如果说,以前的小说基本上是林白在说,那么现在就是“他者”在说,而林白在听。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让那些在时世中艰难求生的人们成为话语权利的最大拥有者,从而我们的作家林白获取了一个辽阔的世界。

让“他者”介入,给“他者”以文学形象的首席位置,向来是现实主义文

学的重要特征。《妇女闲聊录》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对典型塑造的刻意追求,这部作品诉诸这个时代的人性的生存情境,这里是最为普通的所谓下层人群的声区。

小说里的叙述者是一位操湖北(一个叫做王榨的地方)方言的女性,她的名字叫木珍,2001年她36岁时候和2004年她39岁的时候,同样是在北京东四十条说话,她的方言没有多大的改观。方言的度如何掌握,有时候决定着作家对乡土的态度。这一直是现代文学的老问题了,从上个世纪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小说,经由20年代末期的王鲁彦、蹇先艾等人的新变,再到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师陀、废名等京派小说的成熟,解决了地域意义上对乡土中国人性生存的理想营构模式,前辈们在对方言的过滤中解决了乡土叙事的“雅”。

文学问题,但是在对“风俗习惯”的描摹的背后,知识分子的主体情愿中,对乡土人性之“美”的依恋,胜过了对乡土之“痛”的体验和呈示。林白的这部长篇启示我们:方言在怎样的程度上进入小说,似乎决定了作家对乡土的趣味、风物、习俗的态度,这一切在今天,它们不能不通向一个显而易见的人文课题——写作中对方言的使用便是文学对民瘼的呈现。木珍一直在说,她在说事,不够连贯,她不会写景抒情和心理分析。这一点就是《妇女闲聊录》区别于以往乡土小说的地方。她在京城里的讲述,使得她自己的视线带有回看的特色。她没有“卧听萧萧竹”的优雅,她毫无价值判断的对日子的回述,在有心听竹的读者那里,不啻便是“民间疾苦声”。

离开故土进城“打工”,给乡村带来的原有伦理秩序的撕裂和人文价值的倾颓,在求生的木珍们口中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我们看来,其中的文化危机不仅属于乡村,它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失衡性的展现。木珍所说的回家过年,都在一个“钱”字上热闹,那些赌博、离婚、二奶、失学、生育、假货等等等等,其实是一种锐利的“说穿”——漫长的转型期给中国带来的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的衰败,在这些巨变的社会性问题

之下,是人心的惶惑不安,是手足的不知所措,它造成的是越来越多随波逐流的人潮和不得不放弃操守的心智。老巴尔扎克的时代来了,《妇女闲聊录》生逢其时。

如此令人紧张的问题,在得到过真正的写作锤炼的作家手里,叙事却是放松的。林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放松。就像木珍从遥远的湖北来到北京一样,仿佛只是一个路程而已。木珍们的声息有时候就跟《世说新语》或者《曝背余谈》一样有趣,比如“第十九段 这人是撑死的”里面,那个三类苗他爸,牛跳沟的时候把缠有牛绳的指头弄掉了,“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哎呀,原来是自己的手指头,一开始不疼……我们问他:疼吗?他说疼么西,一点也不疼。后来晚上疼得哭天喊娘的”。更多的时候,木珍是一副农妇无所顾忌的乡语村言,生命力倔强顽强地释放在她自顾自的放松状态中,这是生活和精神无所依凭的人最后的靠山。所以林白的不插话,我们既可以从小说叙述的革新探索层面予以诠释,也可以理解她为对我们所习惯视而不见的辽阔世界的敬畏。

《妇女闲聊录》的出现,让我们不能不回头检视多年来的写作习惯,作家们用作品说话,在作品中自己的话似乎过多了,文学世界变得狭小无趣,更变得失却痛痒,他者的声息渐次隐退之时,“我”的喋喋不休就成了聒噪。林白来了个大翻盘,让他者的动静直接撞击我们的耳鼓,也许又会带来新的不适应。文学史事实告诉我们,先锋性的实验总会带来回溯与中衡,凡大作品一是会提供新的可能性,再就是对以往经验进行了出色的集大成的展示。《妇女闲聊录》具有这两方面的品质。在长篇语体上是一种胆大包天的尝试,她超越了1980年代“口述实录”文体的单面性,它的繁杂程度和现实勇气令我们肃然起敬;在众多虚伪的“底层关怀”作品打着“真实性”的幌子大量堆积的文坛,它对“真切度”的充分尊重,更让我们感到现时代心灵生活所渴望的是什么,我们以往的平白无力也愈加彰显。

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 “下降”的艺术

——谈《妇女闲聊录》

张新颖

先是在《天涯》上读到一部分,接着是《万物花开》的附录,现在,它已经完全独立、自足,它就这样,自个儿在这里了。

一开始,我们或许只是把它当成有趣的“民间语文”吧;当林白告诉我们《万物花开》的部分素材自此而来,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个人创作和民间叙述之间的关系了。林白说闲聊录和《万物花开》的关系,大概相当于泥土和植物的关系。当时我看到这句话就觉得高兴,但隐隐又有点儿嫌林白说得还不足,我在心里反驳说,闲聊录不仅是泥土,它本身同时还是植物,还是花朵。我们的认识不能到这里为止:在民间的泥土上生长个人的植物和花朵;民间本身就植物繁茂,四野花开。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更彻底一些,闲聊录就不可能仅仅是“素材”,更不会只是个人创作的“附录”。

我猜想,这样的想法林白那时大概就隐约意识到了,只是还需要一个明确、清晰起来的过程。毕竟,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万物花开》,已经是长长的一段行程,林白还能走到哪里去?到这个时候,真是能够考验一个作家的天分、力量和勇气。长期在个人幽暗的空间里摸索、挖掘,有一天,开了一扇窗,新的空气、阳光和可以从窗口眺望的景象,一下子带来对一个广阔世界的新鲜感受,在这个时候,一些新的因素就出现在她的文学里了。我说的考验,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作家拒绝这种考验,他们就停留在这

里,你不能说他们的文学里没有活泼的生活和广阔的世界,但那样的生活和世界只是在窗边和门口感受的生活和世界,他们不会走出自己的房间。在我们的文学中,多的就是这样的窗边文学和门口文学,当然,我不否认,在这样的位置上有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清新的风和视野可及的多样风景。但在这个时候,林白却被强烈诱惑着离开窗边跨过门槛走进了辽阔的世界之中,表现出性格里的彻底性。

有了这样的彻底性,才有了这样一部独立的《妇女闲聊录》。

那么,文学呢?

作家走进辽阔的生活世界,如果还一直带着文学的矜持和艺术的优越感,就不可能真正投身和融入其中。他没有对世界充分敞开,世界也不会向他充分敞开。我们说文学来源于生活,所以作家向生活世界学习,看起来是个低姿态;但我们又相信文学高于生活,所以他面对生活世界的时候不可能不带着文学的矜持和艺术的优越感。他要从生活世界中提炼出精华,把它“上升”为文学和艺术。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仔细追究起来非常有意思,会暴露出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深究,但不妨换个方向思考:如果文学不是一门“上升”的艺术,而是一门“下降”的艺术呢?如果文学放弃了它面对辽阔生活世界的矜持和优越感,它会失去什么,又将得到了什么?

《妇女闲聊录》至少是一次尝试,尝试把“上升”的艺术改变为“下降”的艺术,从个人性的文学高度“下降”到辽阔的生活世界之中去。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对于林白本人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也深刻地触及到当代创作的某些根本性的问题。

二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述复辟时代的法国农民,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爱德华·萨义德把这句话放在《东方学》的扉页。我在这里也借用这句话,来讨论底层表达和民间叙

述的问题。

无论从压迫他们还是从解放他们的意义上，底层民众长期以来被视为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他们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沉默，不说话。

可是，他们真的不说话吗？

当“说话”这个词换成“表述”“表达”“叙述”的时候，似乎就有理由把他们描述成“沉默”的了。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说话，可是他们的说话够不上“表述”“表达”“叙述”的程度，他们的说话不“规范”，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的话不是话。

那么，谁的什么样的话才算是话？是谁怎么规定了什么样的说话才“规范”，才有“意义”和“价值”，才够格称得上是“表述”“表达”“叙述”？

关于表达的权力机制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地被建构着、调整着、巩固着。在这一整套复杂的大系统中，文学更是通过对其“特殊性”的强调，被视为非同一般“表述”“表达”“叙述”的话语，只有少数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能掌握和使用这套话语。越是强调“特殊性”，它的排斥性就越强；排斥性越强，“特殊性”也就越突出。文学为什么总是喜欢讨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之类的问题呢？其中的一个秘密就藏在这里。

我想《妇女闲聊录》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它打破了那种农民不会说话、只能由别人代他们说话的假设，让一个到城里打工的妇女直接开口。这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神色飞扬。她讲现实境遇、留存在个人记忆中的历史、村庄的人与事、当地的风俗和事物，散漫无际，却也像流水和风一样，浑然天成。文人作文，师法流水和风，“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依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真正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文人，恐怕少而又少；不是文人的木珍，倒庶几近之。她不是文人，不要作文；她开口说话，也并不关心“规范”“意义”和“价值”，她本就是闲聊而已。